

【主持人语】本期专栏刊出四篇相关文章, 这组文章或取宏观比较文学的视野, 对区域文学的有关问题加以研究与探讨, 或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科现状加以概括分析。希望这些文章能够有助于深化中国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

【主持人简介】王向远(1962 -), 山东人, 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抗战史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入选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文学、东方文学、日本文学、中日关系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 主持国家重点图书(丛书)出版项目2项, 发表论文110余篇, 出版学术著作17部(含合著4部), 译著若干。学术反响文章收于《初航集: 王向远学术自述与反响》(重庆出版社, 2005), 主要代表作收于《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论亚洲文学区域的形成及其特征

王向远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亚洲有三大文学圈: 东亚地区的汉文学圈、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印度文学圈、西亚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文学圈。这三大文学圈既具有相对独立性, 也具有相互关联性与相互重叠性。三个文学圈以宗教传播为驱动力, 各自不断地从中心向外延伸扩散, 最终在各自的边缘处互相叠合, 最终“三块连成一片”。由此, 亚洲文学区域得以形成。如果说欧洲文学区域具有“两点(希腊、希伯来)连成一线”的“同源、单线演进”的特征, 呈现“y”状结构, 那么可以说, 亚洲文学区域则呈现出“三点扩散、渐次重叠, 连成一片”的特点, 在结构上犹如三个边缘相接的圆环。

关键词: 文学区域性; 亚洲文学区域; 文学圈; 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 I3 - 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9)01-0116-05

一、汉语文是东亚各国传统文学的血脉

汉文化在东亚文化中的核心辐射作用经历了两个步骤。首先是大陆地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逐渐影响与同化。性情温良的南方少数民族在与汉人的长期交往与接触中, 自然而然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 并逐渐地、不同程度地融入了汉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之中。性情暴烈的北方地区以游牧为生的各少数民族不断入侵中原, 汉人在被动防御与积极抵抗的过程中, 使汉文化在北方塞外地区得以扩散。由于军事取胜而入主中原的蒙古人、满族人, 则在文化上被汉文化所征服, 自动地全盘接受了汉文化。于是, 在亚洲的东部大陆, 逐渐形成了幅员辽阔的先进的汉文化本土地带。它像一个巨大的磁石, 对周边民族的海岛、半岛地区的东亚民族国家, 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东部的越南等, 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也为这些东亚国家学习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儒家思想及中国的社会政治伦理学说, 可以为东亚各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与人伦关系提供思想理论基础; 印度传来经中国翻译改造后的佛教经典, 又可以为东亚国家提供完备的宗教信仰体系。而学习和接受这一切, 首先就需要学习汉语, 学习汉语, 必然就会接触到汉文学。对汉字汉文的引进、改造与使用, 为“东亚汉字文化圈”及“汉文学圈”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

收稿日期: 2008 - 06 - 10

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东方文学、翻译

汉字和汉文的东传,对于当时没有民族文字的韩国、日本、越南的文化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起初三国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都直接使用汉字,并利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于是汉语文就成了东亚各国的共同语文。后来,三国先后参照汉字创造了各自的民族文字,并产生了民族文字的文学作品。但即便如此,汉诗汉文的创作却没有因为其民族文字的创立而停止。越南的汉文创作一直持续到18世纪,日本与韩国汉诗汉文的创作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上半期。这些创作成为他们民族文学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近现代以后,由于中国的落后与文化吸引力的丧失,汉字和汉文也受到冷遇,韩国与日本都曾试图废弃汉字。但由于汉字文化尤其是汉字词汇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三国的语言文化中,完全废弃非常困难。日本方面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汉字词汇太多,如果不使用汉字标记则可能不知所云,因而无法废除,只是采取了限制使用汉字的政策。在朝鲜文字中也同样保留了大量的汉字词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朝鲜完全废弃了汉字,南部韩国也几度废弃又几度启用汉字。但即使废弃了汉字,其中大量的汉语词汇却无法废弃,且发音上与汉字发音有明显的对应性。越南的文字拼音化后,也保留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与汉文化典故意象。如今朝鲜、韩国乃至越南,仍属汉字文化圈无疑。关于汉字在东亚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曾做过很好的概括,他写道:

我们的民族自从秦、汉以来,土地渐渐扩大,吸收了无数的民族……这个开化的事业,不但遍于中国本部,还推广到高丽、日本、安南等国。这个极伟大的开化事业足足费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之中,中国民族拿来开化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国的古文明。而传播这个古文明的工具,在当日不能不靠古文。故我们可以说,古文不但做了两千年中国民族教育自己子孙的工具,还做了两千年中国民族教育无数亚洲民族的工具^[1]。

在一两千年的历史时期内,汉语不仅是朝鲜、日本、越南文学创作的共通用语,并且出现了“东亚汉文学”这样一种东亚共同的文学形态。据王晓平教授在《亚洲汉文学》一书中的研究概括,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东亚汉文学大致出现过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于8至10世纪日本的奈良与平安两朝的贵族汉文学,以宫廷为核心,以汉唐文学为模仿对象,用汉文修史(如《日本书纪》),用汉文作文(如《经国集》、《本朝文粹》、《本朝续文粹》等),用汉语赋诗(有《怀风藻》、《文华秀丽集》等)。同时期朝鲜半岛骀骀文风正盛,古体近体诗多有佳构。而越南使用汉语文体也大局初定。第二次高潮,以12至17世纪的高丽为代表,作者的基本构成是以科举制度为依托形成的文人官僚集团。模仿陶诗韩文,推举苏黄,称扬梅欧,诗话初兴,文集大备。越南的李、陈两朝,尊佛友道,诗文取士,诗多禅语,文尚丽辞。日本在平安贵族汉文学陷于停滞并历经多年战乱的情况下,以远离政坛的佛教五座名山的寺院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五山文学”。第三次高潮为15至17

世纪,是程朱理学文艺思想的光大期,各国汉文学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日本的汉文学则处于中古与近世的过渡期,汉诗创作不绝如缕。朝鲜李朝崇儒抑佛,载道宗经,学奉朱子,诗尊李杜,文人散文笔记大量涌现,在中国的《剪灯新话》影响下,出现了《金鳌新话》等一批文言传奇。越南也出现了《传奇漫录》、《传奇新谱》等汉文志怪小说。第四次高潮在18至20世纪初,是明清文学的呼应期,也是各国汉文学的全盛期。明代拟古文学与唐宋派、性灵派先后在日韩引起连锁反响,汉文学进一步由宫廷寺院走向寻常街巷。日本江户时代独尊儒学,汉诗文创作出现繁荣。朝鲜李朝后期唐宋派古文与主张社会改革的“实学派”汉文学各擅其长,汉文小说与文人笔记十分繁盛。在正统的诗文之外,随着中国白话小说的流传,在日本、朝鲜与越南,都出现了一些中国白话小说仿作与翻改作品^[2]。19至20世纪初,东亚各国汉文学由蜕变走向衰微,日本明治时期的汉文学却攀上最后的高峰而后跌入低谷。幕府末年志士以诗明志,明治初年,新闻出版繁荣,报刊杂志竞载汉诗文,也有试图以汉诗文表现西方新观念新思想者。直到1920年,汉文学才黯然退出近代文坛。越南、韩国随着科举的废止、新学的建立以及文字的变革,汉文学衰微,创作和欣赏汉文学成为少数学者与文人雅士的专利。

汉语及汉文学对东亚各国文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与文体的层面,也体现在作品题材的层面。对汉文作品的阅读,使东亚各国文学运用中国题材进行创作提供了可能,使以中国为背景、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中国题材文学,构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创作传统。在朝鲜,17世纪以反映朝鲜与中国明朝联手抗击日本侵略的壬辰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壬辰录》,也描写中国军队及其将领,甚至《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也出现在战场中呐喊助战。18世纪著名的文人长篇小说《谢氏南征记》、《九云梦》(有朝文和汉文两种版本)和《玉楼梦》、《淑香传》等皆以中国为题材,背景与人物都是中国和中国人。越南古典文学的翘楚《金云翘传》,在题材上采用的就是中国的同名长篇小说。中国题材在日本文学中更为重要。笔者在《中国题材文学文学史》一书中曾指出: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已经有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没有中断,至今仍繁盛不衰。中国题材既是日本文学不可或缺的营养与资源,也是汲取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和环节。中国题材对于日本汉诗汉文这样的“外来”文体是重要的,对于“说话”、“物语”这样的日本文体也同样重要^[3]。例如,在12世纪短篇故事总集《今昔物语集》的天竺(印度)、震旦(中国)、本朝(日本)三部分中,不仅“震旦”部分十卷共一百八十多个故事全部取材于中国,就连“天竺”部分的五卷也是间接从中国汉译佛经、中国佛教类书中取材。“本朝”(日本)部分的佛教故事有许多也受到中国的影响。不久之后,则出现了《唐物语》那样专门的中国题材的短篇物语集。14世纪成熟的日本古典戏曲“能乐”所流传下来的现存240种能乐剧本(谣曲),从中国取材的就

有二十几个,占总数的十分之一。日本近代文学尽管不再以中国为师,而是追慕和学习西方文学,照理说在这种大语境下中国题材应该从日本文学中淡出,但事实恰恰相反,近现代日本文学对中国题材的摄取,反而比传统文学更广泛、更全面,从事中国题材创作的作家更多,中国题材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中国题材日本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题材日本近现代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古代文学缺乏中国现实题材的局面,中国现实题材开始大规模进入日本作家的视野,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的齐头并进、双管齐下,使得中国题材的创作在日本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更为引人注目。

汉语文学是东亚各国传统文学的血脉,汉字汉语的学习与引进催生了日、朝、越各国书面文学的发生,中国历史与文学又为东亚各国文学提供了共同的题材,使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传统文学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东亚文学区域。

二、印度语文是南亚东南亚文学的母体

正如汉语是东亚各国传统文学创作的共同语一样,印度(传统上印度包括了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1947年巴基斯坦从印度独立出去,1971年孟加拉又从巴基斯坦独立出去。)语言文学是南亚和东南亚半岛地区各国文学的共同母体。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实际上都是印度文学的分支。

斯里兰卡(原称锡兰),它不在印度次大陆之上,是印度洋上一个岛国。该岛上的两个主要民族——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最早都是从印度本土迁徙过去的。从印度传去的佛教和印度教文化也占据着统治地位。在古代斯里兰卡文学作品中,除有用其民族语言僧伽罗语写成的以外,还有用印度的巴利语和梵语写成的作品。如公元6世纪由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改写而成的《悉多落难记》。进入中古后期,斯里兰卡文坛以僧伽罗语创作为主,但从内容上说仍以佛教文学为中心。其中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是散文巨著《五百五十本生故事》。这一时期的世俗文学也明显地体现出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例如当时斯里兰卡风行的有关鸿雁传书的诗篇显然是对迦梨陀婆的《云使》的模仿,15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叶斯里兰卡文学史上流行的格言诗,也是由梵语格言诗改写而成的。

东、南、西三面与印度接壤的一个内陆国家尼泊尔,自古就属于古代印度文化版图的一部分。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尼泊尔人。尼泊尔人中大部分是印度教徒,少部分是佛教徒。公元4至5世纪起步的尼泊尔古代文学长期使用梵语写作。1769年尼泊尔境内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廓尔喀语(即现尼泊尔语)被确定为国语,出现了尼泊尔语的文学作品。但在题材、主题与风格上,都与印度梵语文学有着深刻的联系。特别是普遍采用印度教、佛教的题材写作,反映出受印度文化的深刻影响。

印度语言文学对东南亚的影响也相当巨大。当东南亚开始出现国家时,印度文化早已流传至此。印度教、佛教等在这一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使东南

亚特别是中南半岛地区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成为佛教国家,乃至一些西方学者把东南亚这些地区统称为“东印度”、“外印度”或“印度支那”,以强调这一地区与印度深刻的渊源关系。东南亚各国早在民族文字出现之前,其神话传说、民歌民谣等口头文学就受到了印度文学的直接影响。东南亚各民族文字创制之前主要是借助印度的梵语。后来创制的民族文字字母主要是借印度字母创造出来的。例如老挝的寮文字母、柬埔寨的高棉字母、泰国的泰文字母、缅甸的孟文字母和骠文字母及缅文字母、越南南方的占城字母、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字母等,都属于印度字母系统^[4]。东南亚国家在文字上与印度的关联,使他们的书面文学从一开始就受到印度文学,特别是两大史诗的影响。东南亚最早使用本民族文字书写的书面文学是古爪哇语文学,它从内容到形式皆受到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梵语文学的影响。《罗摩衍那》在泰国被称作《拉马坚》,其中的人物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作品都对《罗摩衍那》史诗中的人物与情节反复引用与改编,衍生出各类体裁的作品。泰国的历代国王就非常喜欢借用《摩诃婆罗多》中的人名为自己或爱臣命名,普通百姓也多有仿效。在老挝,《罗摩衍那》被改写成老挝古典名著《帕拉帕拉姆》,老挝古典戏剧中也不乏移植和借用《罗摩衍那》故事情节的例子。同样《罗摩衍那》也被柬埔寨吴哥王朝时期的文人译为高棉文,后来又经过民间艺人结合柬埔寨本土的神话传说予以加工改写,形成了柬埔寨著名长篇神话诗篇《林给的故事》。

另一方面,由于佛教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尤其当南传佛教在东南亚半岛广大地区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以后,佛教文化对东南亚半岛地区的影响更加强大。比如柬埔寨、缅甸等国书面文学的源头都是刻碑记事的“碑铭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无不直接受到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经典中故事性较强的《本生经》(即《佛本生故事》)和散见于其他佛教经典中的佛陀故事成了人们传道布法的得力工具,也成了作家创作的源泉。东南亚半岛各国的佛教文学,大多是以《佛本生故事》为题材的。在泰国、缅甸、柬埔寨等佛教国家中,佛教僧侣作家们长期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僧侣作家除了直接借用印度的佛教文学外,还采取间接借鉴的办法造出仿制品,其中最为典型、影响也最大的作品有两部:一是源自泰国、老挝的《清迈五十本生故事》,一是爪哇的班基故事。《清迈五十本生故事》是完全按照《佛本生故事》的创作方法写成,形式上让人真伪难辨,但故事原型却来自泰国老挝北部一带。“班基故事”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古典文学中以班基王子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非常著名的历史传奇。这个故事早在13至14世纪就在东爪哇形成,班基故事是继印度两大史诗之后在东南亚范围内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也是在印度两大史诗的影响下独创的东南亚第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史诗性作品。

印度语言文学是南亚、东南亚各国语言文学的母体。至少在8世纪伊斯兰文化进入印度西北部和

东南亚群岛地区之前,整个南亚、东南亚地区是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的文学区域。

三、伊斯兰教是中东文学一体化的纽带

西亚中东地区,由于其东西南北交汇处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可耕地与水源及其他资源的缺乏,历史上为争夺地盘与资源,战争频发,历来都是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地区。这里有着以巴比伦文明为代表的悠久的两河流域文明,但各个文明都在互相征战中中断、灭亡。在那里,古老悠久的埃及文明中断了,辉煌一时的巴比伦文明中断了,穷兵黩武的亚述文明中断了,以犹太教为中心的希伯来—犹太文明也数次被打散而流落世界各地,以拜火教为中心的源远流长的波斯文明则被崛起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所征服。整个西亚中东地区长期处于争战与混乱状态,加上该地区以“泥沙”为基本的地表特征,一般建筑物乃至书写材料都以泥土或泥版为原料,日久易损,因而,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及文学作品极少。直到公元7世纪后伊斯兰教兴起及阿拉伯帝国的创立,才把这一广大地区统合起来,有了统一的文化,有了较为繁荣的文学创作,并且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文学区域。可以说,伊斯兰教与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的阿拉伯帝国,既是西亚中东文学的基础,也是该地区各国文学一体化的纽带。对此,埃及现代学者艾哈迈德·爱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写道:

伊斯兰教在融合各种文化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各民族中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人——上层社会的人——认为只有念诵和研究《古兰经》才能加深其信仰,完成其宗教。为此必须学习阿拉伯语,接受阿拉伯文化的教育。这样,他们就掌握了两种文化:本民族的文化 and 阿拉伯文化,亦必然会把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将两种思维方式聚集在一起。很多波斯人阿拉伯化了,很多罗马人和印度人阿拉伯化了,很多奈伯特人也阿拉伯化了。阿拉伯化的含义就是为接受阿拉伯文化敞开了思想和语言的大门,使阿拉伯文化与他们从小就使用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结合成一体。阿拉伯化还意味着为使伊斯兰教代替他们原来信奉的宗教敞开大门。思想、语言和宗教的融合是阿拉伯人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一个原因^[5]。

的确如此。在公元8至12世纪那统一而广袤的阿拉伯帝国中,阿拉伯人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大量吸收东西方文化的营养,包括希腊、印度、波斯的文化,并对帝国境内较为先进的文化加以吸收、同化与改造。从而将早先散沙一盘的 中东凝聚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之下,并在西亚中东地区形成了统一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区域。

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区域的形成过程中,最典型地体现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波斯文化与文学的改造与同化方面。此前的波斯有着自己独立而悠久的文化传统,7世纪中期被阿拉伯征服,从此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一个行省,纳入了伊斯兰教文化的范畴。虽然阿拉伯帝国对波斯实际有效的统治不过一百来年,但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对波斯的改造则是深刻而彻底的。在宗教信仰上,波斯

人改变了自己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而改信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思想基本上从波斯文学中消退。在语言方面,波斯人所使用的中古波斯语受到了强烈冲击,而蜕变为现代波斯语。现代波斯语大量采用阿拉伯字母(32个字母中只保留了4个是波斯字母),同时大量吸收阿拉伯语词汇,约有将近一半的词汇来自阿拉伯语。因而可以说现代波斯语是阿拉伯语化了的波斯语。另一方面,在阿拉伯帝国全盛时期,许多波斯人直接用阿拉伯语写诗作文,成为阿拉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西亚中东地区文学的改造与聚合,还突出表现在土耳其文学中。土耳其是一个文化上后起的、操突厥语的民族。当阿拉伯帝国兴盛时他们还生活在中亚地区,并开始向西迁移,能武善战的土耳其人在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2世纪末,当入侵的蒙古人的势力衰落时,土耳其人继之崛起,一部落首领奥斯曼在小亚细亚宣布成立独立的公国,称为奥斯曼国,以后又不断扩张,到16世纪中叶,形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的军事封建帝国,覆盖了当年阿拉伯帝国的几乎所有地盘。土耳其人在西迁过程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其文化也纳入了伊斯兰文明的范畴。13至14世纪时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流行时,土耳其人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苏菲派教团。这些教团主要通过诗歌创作活动来宣扬自己的信条,产生了所谓“教团文学”,随着伊斯兰教日益深入人心,阿拉伯和波斯文化、文学对土耳其文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奥斯曼王朝的宫廷里以及一些城市中的知识分子眼中,土耳其语是简单粗俗的语言,不能用来进行深刻而优美的宗教、科学与文学创作,因此出现了大量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和语法的现象,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只有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知识分子才能掌握的完全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奥斯曼语。用这种由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混合成的华丽典雅,但又难免雕琢藻饰的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被称为“迪万文学”。当时的作品大多以古兰经、圣训、先知及其门徒的故事为题材。这些都使土耳其文学成为整个西亚地区伊斯兰文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

阿拉伯帝国依靠武力征服、文化怀柔和伊斯兰教的巨大吸引力,陆续将西亚地区各民族文学纳入了统一的伊斯兰文化体系。公元8至12世纪阿拉伯帝国进取、享乐的时代风气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作家大量涌现,写出了汗牛充栋的诗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散文作品,出现了《一千零一夜》及《一千零一日》等篇幅庞大的故事集,从而与中国唐宋帝国的文学繁荣交相辉映,并使同时期的欧洲文学显得黯然失色。12世纪后,阿拉伯帝国分崩离析,分裂为几十个独立国家,各个阿拉伯国家之间、各教派之间纷争不断,常起战火,直至今日。但在政治上分裂与混乱的同时,阿拉伯各国却一直保持了伊斯兰文化的一致性。由于伊斯兰教强大的纽带作用,西亚中东文学圈的整体统一性与区域性充分显示并一直保留下来。

四、“三块连成一片”形成亚洲文学区域

以上大体勾勒了亚洲的三大文学圈——东亚地区的汉文学圈、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印度文学圈、西亚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文学圈——的形成与构造。在整个亚洲文学中,这三大文学圈既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具有相互关联性与相互重叠性。古老的亚洲好比是一个辽阔平静的湖面,湖面上有三块地方浪花涌动,激起了环环扩散的涟漪,打破了湖面的平静。这三块地方就是亚洲的三个核心文化区,即东亚的中国,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和西亚的阿拉伯伊斯兰。这三块地方在空间上大体呈等边三角形分布,他们激起的浪花涟漪逐渐向四周扩展,分别形成了东亚文学圈、南亚—东南亚文学圈、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圈。三个圈不断向外扩散,最终互相重叠,边界变得模糊,遂使得整个亚洲连成一片,形成了亚洲文学区域,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三块连成一片”。

将这三个文学圈联系在一起、重叠在一起的,除了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贸易的带动之外,主要得力于佛教与伊斯兰教的传播。

在中国西汉末年,来自印度的佛教,向北传向中亚(即中国古代所谓西域地区),到了东汉末年,再由中亚拐向东方,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唐代,中国将大量佛经译成汉文,并将佛教一定程度地中国化之后,再向朝鲜、日本与越南北方地区做二次传递,从而在东亚文学圈内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学传统。世俗文学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也受到佛教思想的渗透与影响。这样一来,佛教及佛教文学就把印度文学圈与汉文学圈两者联系起来。换言之,佛教使东亚、南亚两大文学圈得以重合,而重合点就在西域或中亚地区。

在公元12至19世纪,即中国的元明清时代,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向东传播,传至西域即中亚地区,原来信仰佛教或没有宗教的西域各民族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于是伊斯兰教就成为中国西部边疆各民族的共同宗教,在文学上也深受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教文学体系的影响,加上由汉人与阿拉伯人、波斯人混血而成的回族也信奉伊斯兰教。回族除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地区外,还散居在全国各地,并将伊斯兰教文化带到汉土。如此,伊斯兰教就把汉文学圈与西部的伊斯兰教文学圈联系起来、重合起来,而重合点,仍然在西域或中亚地区。

同样的,伊斯兰教在印度文学圈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圈之间,也起到重要的连结作用。13世纪初叶至16世纪上半叶的三百多年间,在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西北部地区,出现了一些小国王朝,总称为德里诸王朝。德里诸王朝统治者一般是从南亚次大陆西北边境入侵的突厥人和阿富汗人。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首次将西亚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文化带到印度。到了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的三百年间,杂有蒙古族血统的突厥族的一支莫卧儿人,在印度中北部广大地区建立了统一的莫卧儿王朝。莫卧儿王朝在德里诸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伊斯兰教信仰,与该地区原有的印度教发生了长期冲突,许多原先信仰印度教的人被迫改信伊斯兰教。在这一大背景下,梵语文学也开始衰微,受波斯语、阿拉伯语影响的印度各地方语言及其文学开始兴起,但它们又都继承了此前的梵语文学传统。于是,印度的西北部地区(主要相当于今日的巴基斯坦),在伊斯兰教与印度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伊斯兰文学与印度文学也发生了融合,使这一带成为印度文学圈与伊斯兰文学圈的重合地区。此外,印度文学圈与伊斯兰文学圈的重合地区,还有东南亚南部的海岛地区,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这些地方原来属于印度文学圈,13世纪后逐渐地伊斯兰教化了。

综上所述,亚洲文学区域的形成有着不同于欧洲文学区域的鲜明的特点。如果说,欧洲文学区域具有“两点连成一线”的“同源、单线演进”的特征,那么可以说亚洲文学区域则呈现出“三点扩散、渐次重叠,连成一片”的特点,如果用一图形来表示,恰似现代奥林匹克的五环旗的结构,不同的是三个环的边缘部分相交叠而已。

参考文献:

- [1]胡适. 白话文学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4.
- [2]王晓平. 亚洲汉文学[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
- [3]王向远. 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4]周有光. 印度字母系统[M]//世界文字发展史.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 [5]艾哈迈德·爱敏.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M]. 纳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360.

On the Formation and Traits of Asian Literary Region

WANG Xiang-y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Asia, there are three literary circles: the Han literature circle in East Asia, the Indian literature circle in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Islamic literature circle in West Asia and Mid-east, which are somewhat independent from each other but correlate and overlap as well. These three circles, propelled by the religious dissemination, kept expanding and disseminating from their original centers, and eventually overlapped on the edges and merged into one piece: Asian literary region. While European literary region has a structure of “y”, which developed from the same origin: the join of Ancient Greek and Hebrew literature, the Asian literary region, so to speak, seems to be three overlapped circles.

Key words: literary regionalism; Asian literary region; literary circl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胡志平)